

泰州学派的精神世界与乡村建设



宣朝庆

著

本书从当前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出发，考察了16世纪的平民儒家学派泰州学派在参与乡村建设中的思想及实践活动，认为平民可以通过汲取儒学等文化资源，担当农村社会建设的主力，激发农村社区的活力，创造性地解决农村发展中的具体问题。泰州学派成员“民间行道”的责任意识、“大人造命”的自由精神，以及他们在民众中着力培养的自治精神和互助合作精神，都值得当代农村社会建设者关注。

中华书局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泰州学派的精神世界与乡村建设

宣朝庆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州学派的精神世界与乡村建设 / 宣朝庆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0.5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978 - 7 - 101 - 07291 - 4

I . 泰… II . 宣… III . 泰州学派 – 研究 IV.B248.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9900 号

书 名 泰州学派的精神世界与乡村建设

著 者 宣朝庆

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

责任编辑 高 天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1/630 × 960 毫米 1/16

印张 16 1/4 插页 2 字数 236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291 - 4

定 价 39.00 元



宣朝庆，1971年生，山东海阳人。先后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现任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曾任汉城大学访问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思想与社会发展。在《中国社会科学》、《天津社会科学》、《孔子研究》、《社会学研究》、《南开学报》及韩国《奎章阁》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学术著作
出版资助项目

序

朝庆是 2001 年进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然后留校任教，所以八年多来无论在学问还是个人生活上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作为他的指导教师，时常与他开展学术讨论与对话，所以对他的学术观点与理路，应该说我比较了解。此番他将其博士论文做认真修订后予以出版，要我在篇首说几句话，这是我乐意为之的。

该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泰州学派的乡村建设思想。这个论题的出现大致由两个方面促成：首先是由于他特殊的生活体验，及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感悟。朝庆在读博士之前曾经在山东地方政府工作三年，很关注农村的发展问题，其中最为关注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农村发展的领导力问题，二是农村富裕之后应该如何发展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为地域不同，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阶段性及特殊性。在农村经济落后地区，发展农村经济是核心任务，一切新农村建设要围绕这个目标展开，但是在不少东部地区农村已经富裕起来后如何进行建设，也正在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前些年天津郊区大邱庄的禹作敏就是个发人深省的案例。其次，选题源于我对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判断和倡导。我在 2000 年以后反复提倡社会思想要关注下层。以往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均取材于历代精英思想家的著作，以精英思想家的社会思想为研究对象。如果把社会思想分为官方的、士林的和民间的三个层次，那么当时所有社会思想史著作基本上都是以“士林社会思想”为中心的。士林社会思想界于上述两者之间，属中间层次。它既不完全等同于官方社会思想，也不完全等同于民间社会思想。官方社会思想往往可以体现在官方政治思想与对实际社会的统治中，而民间社会思想虽十分丰富，却很少能够用文献方式较系统地保存下来。只有士林社会思想，因为文献资料系统而丰富，为研究者提供了分析

的方便,从而成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社会思想区别于其他思想专史的重要特征之一,就在于它更侧重于对民众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之社会生活理念的研究。近年来,通过家训、民谚民谣、传统戏曲文艺、社会风俗的研究,关于社会下层民众的社会思想研究已经有所进展。但是,研究者仍然受到民众生活理念没有系统文献的困扰。朝庆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为了实践关注下层民众社会思想的研究趋向,从张载社会思想研究走了出来,选择以社会下层出身的知识分子王艮为突破口,就出于文献和研究趋向的双重考虑。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是明代理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哲学史的层面,而忽略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他们的领袖人物放弃仕途选择,主动担当农村变革的领导力量,发起了乡村建设。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这样做,除了明代科举考试造成士人过剩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呢?他们的乡村建设到现在还有什么历史借鉴意义呢?当他在选择将泰州学派社会思想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这些问题也一并成为重要的挑战。

社会思想史研究有很多方法,就技术性角度而言,可以从区域、历史阶段、学派、阶层、群体、人物、著作、观念、民族等角度着手,也可以开展比较研究。朝庆的研究从学派入手,却也涉及区域、人物、著作、观念等众多角度,是对于社会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就社会学的传统而言,则可以归到韦伯研究法的系列。韦伯在其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从观念与心态层面探讨了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这种方法,从社会思想史的角度言之,可以归之于社会理念史研究。古代中国的读书人基本上都或多或少地有名利的思想,实现自己理想的途径大多还是选择跳龙门,入庙堂,这个传统从孔孟周游列国就有了。王艮、王襞、何心隐等泰州学派人士能够转轨变道,放下名利,沉潜民间,从事乡村建设工作,以改造基层社会为己任,必有着其丰沛、充足的精神动力,是不能单从士人的社会过剩这一途去解释的。该书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探视这个问题,首先是在导言中白描江淮地区的社会变迁、阳明学说的兴起,交代整体的社会、思想文化环境,为探讨泰州学人的精神世界做了铺垫。在该书的第四章中,详细讨论泰州学人的精神世界,浓墨重彩地揭示

和分析他们的社会批判精神、自由发展观、经世济民理念等。这种精神转变与王艮有着密切的联系。王艮在社会变迁与思想发展过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指标作用，是众多精神特征的开创者。王艮思想能够独树一帜，与他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出身下层，通过经商致富，进而自学成才，却不走仕途之路，而是提倡民间讲学，把儒学价值观转换成平民百姓生活的武器。因此探讨王艮的社会经历与社会思想成为研究泰州学人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一环。泰州后学那么积极地参与乡村建设，与王艮的思想影响是分不开的。

乡村建设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在古代社会中，乡村不单单指农村，而是特指与都市相对，是“礼失求诸”之“野”，是农村、手工业地区等那些都市社会不发达的地方。乡村建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域往往也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征。大致说来，古代乡村由于家族的发达，乡村建设往往不能忽视家族的力量，如义学、社仓、兴修水利和道桥，都和家族有关。从领导力量而言，因为士在四民之中居于领导地位，所以乡村建设的发起者多是士绅阶层和读书人。泰州学人中的王艮、王襞、何心隐、颜钧，都是有一定文化水平而无心追求参加科举，求取所谓“功名”者。从建设形式上来看，古代乡村建设重点在于教化。这些特点都和当代的新农村建设不同，甚至和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也有着很大的差异。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受到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通过教育和合作运动唤起平民的力量，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重建。在古代和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中，国家和政府参与很少，现代社会国家职能完成转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杠杆作用，所以新农村建设以政府力量为骨干，知识分子、民间团体的参与作用倒不显现。因此，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来重新认识乡村建设，尤其必要。

中国古代乡村建设的兴起，还有着思想上的渊源。我们祖先很早就产生和谐生活的信念，成为乡村社会的重要信仰，在《孟子》、《周礼》中均有具体的乡村组织与管理构想。宋代以后，随着社会变迁，张载等理学家根据这些思想影响提出了乡村建设的一些具体措施，如恢复宗法制、井田制，创立社仓、义学、乡约等，都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从深层次来看，乡村建设思想反映的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

社会共生理念,而不是独善其身的自利思想,更不是自然权利(个人自主性为正当)这一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核心价值。社会共生是人与人相与倚恃的生活,是谋共存共荣和共通的协作生活。中国传统认定,邻里社会、乡党社会是一个整体,一个地方共同社会,社会成员休戚相关、利害相同,是一个生活共同体。正如一个人的身体,手要靠脚,脚要靠手一样,也正如一个家庭,兄要靠弟,弟要靠兄,只能共生共存,共倚共赖,而不能单独生存于世界。这种观念是孔子“仁”、“礼”、“不患寡而患不均”等思想的基础,后来孟子把社会共生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进而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荀子则提倡“合群”,主张利益必须普及大众;到了张载则提出“民胞物与”,使社会共生的理念在中华民族传统中根深叶茂。社会共生的理念之产生与中国社会宗族、家族传统有关系,也与农业社会的社会分工等社会性要素密不可分。古代乡里社会人口较少,内部关系极为紧密,那种共同利害的程度、共同生活的程度尤为显著,加强乡村建设以增强社会合作,提高社会效率,提升人民幸福,是一个必然而合乎理性的选择。泰州学派的学者们不求取“功名”,走入基层社会,教化民众,以至何心隐辈用自己的家财从事乡村建设实验,无论其结果是否成功,他们的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深入基层社会以改善和建设基层社会的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与继承的。

由此不难看出,对社会中下层之社会思想的研究,对认识中国的真实民间社会,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作者这本书所作的研究,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对泰州学派之社会建设思想的认识和理解方面,因为朝庆下过多年功夫,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所以我相信有很多地方他比我看得更为周详而深刻。作者用心与用功之处,尚需各位方家读者自己去品味。若有见仁见智之处,与作者展开学术讨论,更是我所希望的。

本书也有些有待改进之处,如本书的研究对于乡村建设的历史勾勒仍然是粗线条的,仅以张载的思想及影响为案例,缺乏更为翔实的论述,希望日后能对这一方面加强研究,予以完善。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舍勒的意见,社会学本身的最终任务是考察那些决定人类生活内容的理想因素和现实因素,以及精神因素和内驱力

因素相互影响的种类和有条不紊的序列。朝庆钟情于斯，研究于斯，乐此不疲，希望他能够进一步下苦功夫，打好基本功，处理好博与约、通与专的关系，早日登上学术研究的殿堂。

是为序。

王处辉

2009年9月1日

目 录

序	王处辉	1
导 言		1
第一章 泰州学派乡村建设的社会条件与时代精神		16
第一节 江淮社会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16
一、商业发展,经济繁荣		17
二、社会流动加快,阶级关系趋向紧张		19
三、社会有机团结增强,各种“会社”蓬勃兴盛		25
第二节 理学反思和自我意识的觉醒		28
一、思想界对程朱理学的反思		29
二、儒家自我意识的特征		33
第二章 儒家乡村建设思想的源与流		49
第一节 和谐——中国社会的精神与理想		50
一、和谐概念的产生		50
二、庶民阶层崛起与和谐理念新诠释		53
三、孟子的乡村社会理想		57
第二节 张载的乡村建设思想及其影响		62
一、张载的乡村社会观		63
二、张载的乡村建设思想		65
三、张载思想对两宋理学家的影响		70
第三章 王艮与泰州学派		73
第一节 作为思想家的王艮		73
一、平民儒学:王艮思想的特点		74
二、淮南格物:王艮之平民儒学的理论顶峰		79

第二节 投身乡村建设的王艮	85
一、农村社区领袖的重要性	86
二、王艮作为乡村建设领袖的个人素质	88
第三节 私人性联系的发展与个人角色转型	95
一、灶丁：国家给王艮的身份	95
二、贩盐：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	98
三、重拾儒学：领悟孔门要旨	101
四、求学与传学：王阳明门下的“狂者”	105
五、泰州学派：私人性联系的团体化进展	112
第四章 泰州学派的精神世界	117
第一节 “伤时忧世”的社会批判精神	119
一、政治依赖性弱化，疏离感加强	119
二、反思科举制度及教育	125
三、抨击官僚阶层的劣行	129
四、“生逢溺世待急救”	130
第二节 “大人造命”的自由发展观	133
一、王艮提出“大人造命”	134
二、“御天造命”的精神实质	135
三、大人造命思想的来源	138
第三节 “民间行道”的经世济民理念	143
一、放弃阳明学派“得君行道”的经世理念	144
二、“不袭时位”服务社会下层的新理念	145
三、民间经世——走向乡村建设	147
第四节 “人人君子”的小康社会理想	150
一、王艮的“君子国”理想	151
二、泰州后学对“君子国”理想的完善	154
三、“君子国”理想的性质	156
第五章 建设孝义文明的邻里社区	
——泰州学派乡村建设实践之一	159
第一节 明代家族发展与研究视角	159
一、中国人的家族观	159

二、明代的家族	162
三、明代家族研究的视角	167
第二节 创建义门——“草根性”的家族组织活动	169
一、王襞创立王氏“宗会”	169
二、何心隐创立“聚和堂”	170
三、家族建设活动包含的新因素	174
第三节 倡率孝义——重塑家族的精神世界	176
一、孝悌与仁义、良知、礼的关系	177
二、新孝悌观	179
三、提倡运用教化手段提高人们的孝悌之德	181
四、义——对孝悌意识的创造性转化	182
五、加强富人承担道义的强度	187
第六章 开启自由个体化社会之路	
——泰州学派乡村建设实践之二	191
第一节 “师道经世”与平民讲会	193
一、师道经世	193
二、祖述圣贤与自我认同	195
三、讲会的民众秩序对“师道经世”的制约	196
第二节 泰州学派的平民讲会活动	200
一、泰州学派平民讲会的三个阶段	200
二、王襞与韩贞的平民讲会活动	203
三、罗汝芳的讲会活动	204
四、何心隐死于会讲	206
五、平民讲会衰微的内在原因	209
第三节 泰州学派平民讲会的特点	212
一、成员平民化	212
二、教育风格简易化	214
三、讲会制度化	216
第四节 讲会对平民生活的重要影响	219
一、平民讲会改变了基层社会精英结构	219
二、平民讲会增强民众的社会认同感	221

三、平民讲会激发民众的个体性与自主性	223
四、以个人为主体的横向社会关系得到发展	226
结语	231
第一节 创造性转化:泰州学派的历史贡献	231
第二节 民众思想的谱系:泰州学派在中国社会 思想史上的地位	236
第三节 乡村建设:一个历久弥新的主题	240
主要参考文献	245
后记	255

导　言

一、问题的缘起

进入新世纪以来,改革开放满三十年,中国日新月异,农村社会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在经历从传统农村到现代农村的历史性转变。面向未来,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农村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具备了一系列有利条件。从宏观层面看,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反哺农业的局面已经形成。来自政府工作报告的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农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降到11.8%,全国财政收入3.93万亿元(政府工作报告,2007)。由于财政收入保持稳定增长,国家有条件拿出更多的财力支持农业和农村。财政支农资金自2004年起,成为中央四个一号文件中支农惠农的“大菜”,有力地支撑了近年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增收效应明显。据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3587元,实际年增长率自1997年以来首次超过7%,为7.4%。2007年中央财政预算将安排3917亿元用于“三农”建设,比上年增加520亿元,主要用于继续加大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在工业化进程加快的同时,我国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2004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1.8%,城市对农村的带动能力继续加强。据预测,202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5%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总就业的比重将降至1/3,农村人口减少到6亿左右。同时,我们也赞同这样的观点:中国加入WTO、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化、城市居民收入提高所引发的消费习惯变化以及一体化供应链的发展等都是推动变化的要素。中国农业和农村地区有很多机会来利用这一新环境而取得发展。

但是,这些变化仍然抵消不了人们对于农业部门与农村地区的疑

虑。目前仍有8—9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多实行分散化生产,以小农经济为生,传统的农业生产和营销模式越来越缺乏活力。市场发展要求提高生产规模,使拥有少量土地、分散的农民们处于不利地位。同时,满足新的市场需要又对技术服务和支持提出了要求,而这是现有农技推广和服务部门无法满足的。低下的农业生产力不能满足农民增收的心理需求,大量人口希望进入城市寻找致富的机会,结果不仅自己落入城市底层,也给城市带来了各种压力和问题,同时在农村地区留下老人、妇女和儿童,使农村致富无人,发展无力。总而言之,农村社区缺乏活力,农村与城市相比缺少竞争力,“三农”危局依然如故。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提出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农村社区缺乏新农村建设的动力,等资金、要政策、靠帮扶的现象比较严重,以至于在很多地区形成了政府推动而农村不动的局面。怎样才能激发农村社区活力,顺利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顺畅地完成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成为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课题。

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全国各地也涌现出众多经济较发达的村庄,它们在经济发展之后,也面临很多新的社会问题。如有组织层面上的干部素质问题,有社会生活方面的养老问题、生活满意度不高等,还有精神空虚、价值观迷失及由此导致的赌博盛行等问题。这些问题说明,新农村建设不是只有发展经济一种模式,必须探索富裕地区农村发展的新思路。富裕地区的农村在发展经济,推动农业社会发展的同时,也要探索干部培养、价值创新和精神文明建设等重大问题。

考之于历史上的新农村建设,宋明理学家们曾经计划以地方士绅为社区领袖,推动乡村组织重建、地方社会工作开展,建平民宗族、社学、义仓,建立乡约等制度设施,在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士绅以社区中的退休官员、候任官员等为主,在现代化社会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出现的群体。然而,在16世纪的新农村建设中涌现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平民儒家学派——泰州学派,他们的很多成员一生没有什么功名,能够在芸芸众生中自觉地站出来,担当新农村社会建设的领袖,汲

汲于农村社区的建设,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恰恰回答了我们关心的问题——激发农村社区的活力,关键在于培养一批农村社区建设的领袖,由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创造性地解决农村发展中的具体问题。中国社会不难产生各个层次的领袖人物,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指出,“中国社会只要有群众会合,便会有集体组织,集体中亦自会有领袖,这是中国的国民性”^①。但是,泰州学派诸人是如何走上新农村建设的道路,如何获得新农村建设的蓝本和资源,是我们特别想得到答案的问题。本书正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思考与研究的。

二、泰州学派的风采

泰州学派是指创始人王艮及其门人的学派,是从阳明心学流出的一个平民儒学的分支,它在明朝中晚期非常活跃,对当时的思想与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在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占了很大的篇幅。该书在“泰州学案”之首说道:“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这是很重要的评价,指出泰州学派是阳明心学发展、传播的重要环节,泰州学派的发展影响了阳明心学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最终也超越了阳明心学的框架,成为新思想的起点。该学派之得名,主要是因为王艮的出生地在明代的南直隶泰州(今江苏省东台市安丰镇),另外是因为部分主要成员的出生地为泰州。同时,以开宗立派的代表人物的里籍来为一个流派命名,是古代社会比较通行的命名方法之一,并不表示它的成员都属于同一地域。如王艮、王栋、王襞等是泰州人,而颜钧、何心隐、罗汝芳等则是江西人。因此,只要是宗泰州学派宗旨,又与王艮有师承关系的,都可归入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既是阳明心学的继承与发扬者,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嵇文甫指出,泰州学派的出现是“明朝中叶以后,由商业资本扩大而深入的结果”。在商业化发展导致了诸多社会经济上的深刻变化的同时,也“演成思想革新的潮流,所有当时的政治运动、社会运动、思想运动都是那种愤张跃动的时代心理所形成,而这种时代心理却是由那外

^① 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第72页。